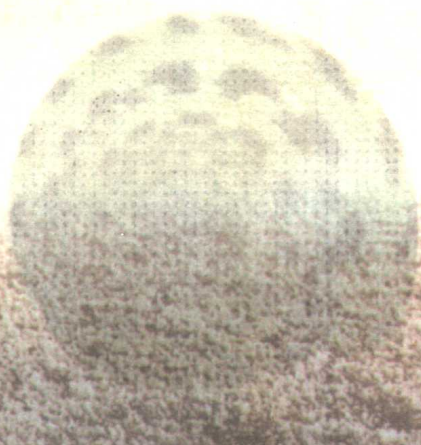


蒋学模 自选集

上 / 海 / 著 / 名

学 / 者 / 文 / 集



重庆出版社

上 / 海 / 著 / 名 / 学 / 者 / 文 / 集

蒋学模 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学模自选集/蒋学模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10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ISBN 7-5366-4272-5

I. 蒋…II. 蒋…III. ①蒋学模-文集②经济学-研究-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699 号

责任编辑 周显军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蒋学模自选集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350 千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5366-4272-5/F·163

定价:28.00 元

学术自传

漫长的追求和探索

重庆出版社约我出一本文集,并要求我写一篇两万字的学术自传。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回顾 80 年走过的人生道路:怎样向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它、宣传它、研究它,一些时候似乎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它,而后来又往往发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真正弄懂它。理论本身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美好的愿望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使我困惑,促使我进一步探索。困惑与探索,是理论研究的永无止境的历程。我愿敞开心扉,把在这一历程中的感受谈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我是怎样走上政治经济学的 的教学和研究之路的

儿时的两个愿望

我对经济学感兴趣,把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毕

生的选择,这同我所处的时代条件有关。我生于1918年。1924年,当我还是一个6岁的孩子的时候,我离开浙江慈溪的故乡,随父亲来到上海。我的父亲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个普通职员。在旧社会,银行职员的收入在工薪阶层中算是不错的,可以过不愁温饱的小康生活。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大环境,特别是上海这样一个充斥着租界、洋行、洋人和外国巡捕的畸形的大都市,处处都充塞着令人摆脱不了的民族屈辱感。加上小学历史课里讲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等等帝国主义侵华的史实,再加上每年到五月,“五三”、“五七”、“五九”、“五卅”数不尽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切,使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我,感到异常苦恼,切盼有那么一天,中华民族能够彻底挣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時候,我的小脑袋瓜里还装着另一个苦恼:旧社会工薪阶层最怕失业。有一次,我的父亲算错了一笔账,虽然只是几分钱的事,而且当天就在扎账中发觉和纠正了。但银行工作是不允许有任何差错的,结果受到银行的一次警告处分。这件事引起了家里一阵恐慌。妈妈生怕爸爸因此被银行辞退,在家里愁闷了好多天。当时,我正在读小学,比我长3岁的姐姐正在读中学,比我大9岁的哥哥刚进大学。妈妈说,如果父亲失了业,我们兄弟姊妹3人都得失学。这一场虚惊虽然为时不久,但我家常有失业的亲戚和同乡来访,要求为他们介绍工作。他们走后,妈妈总要就此发表感叹,同情他们失业的痛苦,哀叹就业的困难,勉励我们用功读书,掌握将来谋生的本领。妈妈的这些话,使我担心我长大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我期望,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人人都不愁失业,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饭吃,那就好了。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儿时的这两个

苦恼的问题和两种期望,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峻和迫切。“九一八”、“一二八”,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伸向上海,伸向全国。而当时统治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对外百般忍让,对内拼命搜刮民脂民膏,疯狂剿共,镇压爱国民主人士和要求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弄得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在这期间,我儿时的两个苦恼和两种期望也演变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那儿?第二个问题是,我个人往何处去?我个人的出路在那儿?

最初的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时时萦绕在我脑际的这两个问题,是从两方面逐步找到答案的。一个方面,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学生运动。我从高中时代起,就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渐明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寄希望于当时的蒋政权是要落空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争得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像苏联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30年代的苏联是中国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土),中国才能走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同时,只有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出路问题才能解决。

帮助我解答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读书,是进步书刊的引导。在这一方面,我得感谢我的哥哥蒋学楷,他当时就读于中国唯一的一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学校上海劳动大学社会学系。劳动大学的学生都是家庭比较贫苦因而思想比较进步的。他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我哥的书架上有许多社会科学的书刊,成为我淘金的矿床。

第一本引起我兴趣的书是孙本文的《社会学ABC》。这是一个小册子,是社会学的一本入门书,学术性并不强,但对

于我这个初步接触社会科学的中学生来说,它的价值是使我惊奇地发现,原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有人专门把它当作一门学科的对象来研究,并且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后来读了一本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书,眼界进一步打开。波格丹诺夫是俄国的一名唯物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后来在苏联遭到错误的批判。但对我有意义的是,他向我展示,原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现在世界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都是要发展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而在未来社会里,将不再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至此,我幼年时期的两个问题,总算初步从理论上找到了答案。从此,我孜孜不倦地去找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来读。当时在30年代的上海,能找到的是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寥寥几本书。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1938年在重庆出版,我又如饥似渴地硬啃。在四川大学经济系,老师课堂上讲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我自己有兴趣钻研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0年代初,在我从四川大学毕业以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通过地下党在一些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通过这本书,我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些了解,使我更加向往社会主义了。

从翻译工作者走向经济理论工作者

在旧社会,“毕业即失业”。那个时候,谈不上什么“专业对口”。你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我在1941年夏天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也曾经可以说是有过专业对口的经历,在香港《财政评论》社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译。但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英国驻港总

督投降,香港被日军占领。《财政评论》社内迁,我的哥哥蒋学楷在香港被日军枪杀。我几经流离颠沛,又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经川大老师金孔章的介绍,进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当一名编译。这也算是搞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是同经济学搭界的。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研究机构,根本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地方,而是十足的官僚机构,是安排闲散人员的地方。每天上班、喝茶、抽烟,看报纸、聊天,但谁都不干研究工作。谁要是真想干点研究工作,那就要受到讥嘲和挖苦,因为那不是衬托出那些官僚们的无能和无聊了吗?初出校门不久的我,在那样的气氛中,简直感到要窒息了。正巧在我进财政研究委员会不久,复旦大学《文摘》社需要一位编辑,来同我联系,我就毫不犹豫地辞去财政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真正是应了“五日京兆”的谚语。

《文摘》社的主编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曾因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辩护而闻名全国。《文摘》杂志 1936 年创刊于上海。原来是一个 16 开每期 200 多页的大型刊物,摘要刊登国内外报刊和书籍的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方面文章的综合性月刊,曾在国内有很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复旦大学内迁武汉,最后落脚在重庆。由于受出版条件的限制,到我在 1944 年进《文摘》社工作的时候,《文摘》从篇幅上看,已缩小到 16 开每期 32 页的半月刊,不再摘载国内书刊和报纸的文章,全部是摘载外文书刊,主要是英美书刊上的文章。内容也从综合性期刊转变为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动态的刊物,主要摘译政论性文章和报导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的文章。外文稿源在太平洋战争前主要依靠从香港寄来。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则主要依靠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抗日战争期间,一般人无缘接触外文书刊,所以《文摘》在抗战大后方是一份很受欢迎和有较大影响的杂志。

《文摘》既然是专门摘译外文书刊的杂志,所以编辑部的主要工作就是选稿和译稿。《文摘》虽然有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但编委们实际上不承担具体工作。具体的编辑工作由常务编委贾开基负责,我的工作承担部分选稿和几乎全部翻译工作。从我1944年进入《文摘》社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文摘》社结束,我实际上是一个翻译工作者。除了每月两期《文摘》约10万字的翻译任务外,我还翻译了几部文学古典名著、长篇小说、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其中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一直到现在还畅销不衰。常常有人怀疑,这个翻译《基度山伯爵》的蒋学模是不是就是那个搞经济学的蒋学模。因为文学著作翻译与经济学研究是太不搭界了,而中国同名同姓的人又是太多了。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申明,蒋在百家姓中是一个小姓,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蒋干,《水浒传》里有一个蒋门神,不像张王李赵那么多。在现实生活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个蒋学模。我这一辈子,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工作者到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历程,这就是为什么《基度山伯爵》的翻译者竟又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缘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文摘》社也随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继续出版。1945~1949年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纸张、印刷费日升夜涨,而刊物一旦出版,定价便不能变动,刊物的再生产难以为继。同时,国民党政权在垂死挣扎中加强了反动统治,1948年禁止《文摘》向外地发行,以致《文摘》不得不停刊。上海解放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文摘》稿源断绝,更无法复刊。这样,《文摘》社停办,文摘社的人员调到复旦的有关部门工作,我就到复旦经济学系任教。最初开了两门新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不久就转而任教政治经济学,从此,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漫长而曲折的探索。

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曲折探索

向苏联专家学习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就派工作组进驻各高等学校领导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首先是课程改革。解放前的复旦经济系教的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现在要改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不仅是经济学系的基础理论课,而且是全校所有系科的一门政治理论课。

要完成课程改革的这一转变,很明显地有两个跟不上。一个是教材跟不上,另一个是教师跟不上。当时不仅上海高等院校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全国都有同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1950年在北京建立中国人民大学,邀请苏联专家来讲课,并要求全国各地的高教局选派高校青年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向苏联专家学习。复旦派去了5个教师,其中去学政治经济学的是我和苏绍智。苏绍智学了一年就被学校召回来,我则经过再三要求,学校同意我延长一年,1952年夏天才回来。

在人大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这两年有什么收获呢?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在于有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可以系统地研读马、恩、列、斯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我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对它发生兴趣,但读的都不是马恩列斯的原著,而是中国作者和日本作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那些著作,作为入门

书是有作用的,但不读原著,总觉得没有摸到底。现在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来读原著,这是最大的收获。当时,1950年,郭、王译本的《资本论》三大卷已经出齐。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当时还没有中文版,但已有莫斯科中文版的《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的几本文集。通过读原著,特别是仔细研读《资本论》,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这是最大的收获。至于苏联专家的讲课,我的印象是比较拘谨,念讲稿,而且要通过翻译,所以关于《资本论》的讲课,关于联共(布)党史的讲课,大家感到帮助不大。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部分,当时,在十月革命胜利了30多年的苏联都还没有出版一部专著或教材,因此,大家对于苏联专家这一部分的讲课是很感兴趣的。据说,苏联专家依据的是联共中央党校的提纲,但不管怎样,给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提供了第一个框架,这总是大家热烈企盼和欢迎的。

根据人大两年期间学习的收获,我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讲话》1952年在开明书店出版。后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以后,我又补充了新的内容,同样以《政治经济学讲话》的书名在195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书。1952年我回复旦以后,与复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志一道,编写了一套供大学本科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讲话”和“讲义”,由于是国内的第一本包括有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印行了近100万册,政治经济学讲义不仅复旦用,华东很多高等学校也采用了。

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年出俄文版,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中文版。由于当时我们

各个方面都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苏联教科书)一出,高教部就通令全国高校一律采用,我们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就停止印行,改而采用苏联教科书。

从1955年到1958年,苏联教科书的观点,实际上,斯大林的观点支配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斯大林,作为领导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领袖,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享有巨大的威望。所以,以斯大林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观点为指导,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为依据的苏联教科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权威著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普遍采用的国际教科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研究的活动余地是不大的。在这一期间,我的经济理论工作,除了教学以外,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论宣传和政治经济学普及的工作。1955~1956年期间去北京与方方(王惠经)和陈道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常识》,由学习杂志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高潮,而学习杂志出版社是中宣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社,所以这本书成为一本畅销书,一年之内印行了280多万册。1954~1957年期间,我还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分配》等小册子。另一个方面,做一些在经典著作中钻研名词、概念的研究工作,写了几篇关于《资本论》中纯粹流通费用补偿问题、《哥达纲领批判》中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按劳分配的劳动形态问题等方面的文章。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现实

问题的研究,在当时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由计划安排好了的,感到无从下手。受薄一波同志在党的八大上的一个发言的启发,我写了两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文章。另外,还有一篇关于按劳分配和工农收入对比关系的文章,是参加学术争鸣而写的。这一时期,虽已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受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风到后来反右派的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学术界和气氛是很压抑的,不活跃的。研究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是当时理论界普遍的心理状态。

苏联教科书的采用有一个曲折。1958年,我国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引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同苏联教科书里提出的观点是不相容的,于是就有毛泽东1959~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的谈话记录,于是就有根据毛泽东的这一份谈话记录全国各省市自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中止使用苏联教科书。但到1963年,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和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后,为了在理论上堵住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左”的偏差,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又在一次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会议上宣布停止使用各地自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律恢复使用苏联教科书。但是实际上,这一宣布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因为1964年和1965年,政治理论课教师 and 大学生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去了。1966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中断了。“文革”结束后,高教部组织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编写我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此,彻底割断了苏联教科书与我国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联系。但由于

苏联教科书曾经一度在全国高校普遍采用过,它的影响可能还是有的。究竟怎样来评价苏联教科书,怎样估量它对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这里来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对苏联教科书评价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它的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这里要讨论的也仅限于它的社会主义部分。

苏联教科书的俄文第一版是1954年出版的。这时距十月革命已经37年了。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资本主义部分而无社会主义部分。这本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提供了有一定体系结构贯串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或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集中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反映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角度看,此书的出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这本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指导下编写出来的,所以它也就体现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那些缺点。这本书是以苏联经济模式为背景、在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写出来的,它把苏联一国的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当作客观规律性的东西来阐述。这本书是由苏联十几个经济学家集体编写的,所以也就难免有集体编写教科书的那种章节结构松懈,文字呆板的缺点。最根本的是,这本书是在只有苏联一个国家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甚至自称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写出来的,因而它的不成熟是无可避免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百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快要终结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他能够从剖析丰富的现象形态,发掘出内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只能产生不

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不能苛求于苏联教科书的作者们的。

苏联教科书对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影响是有的,但也不能估计得太严重。毕竟,全面采用苏联教科书,只是1955年到1958年一共4年时间。1959年起,就开始以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为指导,以苏联教科书为对立面来编写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虽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曾在1963年要求高校教师恢复采用苏联教科书,但实际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十年“文革”期间,更是把苏联教科书当作修正主义样板大批特批。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应该说不是很大了。至于说我国经济理论界的教条主义的学风,那是不能用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来说明的。苏联教科书之前,有教条主义。苏联教科书之后,也有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不能期望通过批判苏联教科书来达到转变学风的目的。鉴于有些人想通过批判苏联教科书来建立一种“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为全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怀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名为批判苏联教科书,实际上是要否定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是,要求政治经济学不要再去研究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这倒是一个很大的原则性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

毛泽东经济理论观点的影响

就我个人来说,其实,决不仅仅限于我一个人,而是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苏联教科书,而是毛泽东的经济理论观点。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劳最大的建国元勋,在全

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建国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随之增长起来的对他的个人崇拜,更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神坛,他的话成了“句句是真理”。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作用来看,他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影响是极为重大和深远的。没有人称他为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他发表了许多很重要的经济理论观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研究有过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观点,按时期来分,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以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关于根据地土地政策、发展生产、发展工商业、以及财政经济工作的理论观点。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

第二阶段,建国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理论观点。包括过渡时期总路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农业合作化、中国工业化道路、沿海和内地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等。这些理论都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有些观点,是同前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例如,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关系,斯大林的观点是必须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等到工业能够为农业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时候,才能去搞农业集体化,苏联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则提出先农业合作化、后农业机械化,认为只有先把小农生产变成了集体大生产,才能创造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社会条件。中国就是在1956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理论观点,很多是切合中国实际,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如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阐述的那些经济关系。有些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些论断,虽然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但从较长时期的实践检验来看,是要求过急,留下了不少后遗症问题的。

第三个阶段,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毛泽东的经济理论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此后在执行过程中在历次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论断。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记录。前一方面毛泽东的观点是大家熟知的,第二个方面即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所发表的观点,没有公开发表过,当时曾以白头文件发到各省市第一书记手中,上海市委只有柯庆施有一本,但向全体市委委员宣读了。我和一些同志当时在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编写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看到了这个白头文件。后来,我们知道,各省市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都看到了这个白头文件。这个“谈话记录”,当时称做“读书笔记”,是毛泽东同党内几个大秀才一同读苏联教科书时边读边议所发表的一些意见,大秀才们记录下来,就形成了这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记录”。这不是一个正式文件,但将谈话记录以白头文件的形式发到各省市第一书记手中,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我们当时看到的这份谈话记录共有74条,涉及到苏联教科书下册第20章到结束语的许多理论问题,是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最集中的文件。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观点。这一阶段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文革期间发表的“最新最高指示”中,特别是1975年的“理论问题指示”的两个论断:“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